

# Z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方法

■ 邹禧乾 赖凯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4;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本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并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考察了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该群体生育观念可划分为“家庭责任型”“自我愉悦型”“犹豫延缓型”和“个人责任型”四种类型,且“家庭责任型”生育观占据主流。研究进一步发现,Z世代青年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观念影响显著,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式微,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影响“犹豫延缓型”生育观的关键变量。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需重点关注高学历青年群体生育抑制现状并增加生育经济扶持政策、重视“家本位”生育观念宣导以及完善生育保障配套措施降低青年生育犹豫等建议。

**【关键词】**Z世代 适婚青年 生育观念 潜在类别分析 多元Logistic回归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1.013

### 一、问题提出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低生育陷阱”危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成为我国人口增长模式的显著特征<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与我国逐年下降的社会生育率相伴而行的是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逐渐趋于消极,表现为“被动性晚婚晚育”以及“恐婚恐育”等抑制性生育观念在青年群体中蔓延<sup>[2]</sup>。在“三孩”政策刺激生育意愿的宽松人口发展模式下,考察适婚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振我国总体生育率、应对人口发展难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以往研究较多聚焦于探索已婚青年群体继续生育的意愿<sup>[3-4]</sup>。而实际上,适婚青年群体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简介:邹禧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少年媒介心理;

赖凯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网络社会心理学、大数据与舆情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信任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编号:18ZDA1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孩”生育的减少和延迟是导致社会整体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sup>[5]</sup>。近些年来,成长于“小型化”“少子化”家庭结构之中、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群体逐渐步入职场与社会。Z世代青年是未来推动社会生育最具活力的新生主力军。因此,在我国社会整体生育率下降的时代背景下,对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所持有的生育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显得尤为必要,这将有助于准确把握这一生育驱动重要群体的生育观念态势,并为未来实施针对性生育引导政策提供切实依据。

本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取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样本,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对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类型进行精确划分的基础上,从“个体-家庭-社会问题感知”影响因素的系统视角出发,对影响这一群体生育观念的结构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并提出了未来驱动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社会生育的具体措施。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一)青年生育观念及其转变

青年生育观念是青年生育文化的核心,主要涵盖青年群体对于生育目的和意义、生育意愿以及子女质量期望的看法<sup>[6]</sup>。在我国传统农耕社会和男权统治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催生了早婚早育、男性偏好等传统生育观念<sup>[7]</sup>。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走向纵深发展,传统生育观念影响逐渐式微,青年生育进入“成本约束型”阶段,独生优生成为青年生育观念的主流<sup>[8]</sup>。

当前,晚生育、少生育以及生育间隔延长等特征,反映出我国青年群体生育观念逐渐趋于理性、保守化发展<sup>[9-10]</sup>。从宏观上看,包括Z世代在内的青年群体生育意愿低迷之趋势,被认为是受到国家经济增长、技术更迭以及住房金融化等“时代烙印”的深刻影响<sup>[11]</sup>，“少生”甚至“不生”成为该群体针对外部巨大社会压力实施的一种消极反抗策略<sup>[12]</sup>。从微观上看,青年群体在抚育之际所面临的房价支付、子女教育以及个人就业问题,成为限制该群体生育的主要因素<sup>[13]</sup>。因此,尽管我国生育政策逐年宽松,但现行的生育驱动措施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刺激失灵”的问题。

面临生育压力,青年群体生育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注重个体情感满足以及人生体验成为青年生育的主要价值导向。譬如,无论是针对“90后”<sup>[14]</sup>还是“95后”<sup>[15]</sup>的生育意愿研究发现,青年群体明显表现出一种以自我愉悦为中心的生育观念,生育的自我实现以及幸福价值导向更为重要。在传统婚育价值观念日渐淡化的背景下,Z世代群体的生育行为更多的是出于养育行为实现个体价值及自我成长角度考虑,而非传统家庭义务<sup>[16]</sup>。然而,虽然高度网络参与的Z世代群体总体呈现出了更低的生育意愿<sup>[17]</sup>,但也有研究指出,Z世代的婚育观念尚未发生革命性转型,只是该群体的婚育意愿和观念已经出现显著分化,婚育行为的顾虑因素与政策期待呈现出明显分野的特征趋势<sup>[18]</sup>。

基于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即为探索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具体表现出了哪些类型的生育

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把握该群体生育文化的核心命题,从而为洞察Z世代适婚青年所持有的生育观念提供精确的认识。

## (二)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路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认为,在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个体与其周围所存在的客观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并交互影响,从而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sup>[19]</sup>。著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学者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 Zastrow)指出,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反应会受到宏观、中观、微观三类系统的影响。具体而言,宏观系统指较为宽泛意义上的外部环境结构,例如社会制度、职业组织或社会文化等要素;中观系统指与个体社会关系紧密联系的“初级”群体单位,例如家庭等小规模群体;微观系统指个体的心理、生理及其他社会性因素<sup>[20]</sup>。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照之下,本研究认为,需要将Z世代青年群体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并对影响其生育观念的各类因素进行结构性考量。

首先,从宏观社会影响路径出发,生育观念的变化被认为是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变迁的一种反映<sup>[21]</sup>。特定历史时期的生育政策对于民众生育观念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sup>[22]</sup>。譬如,长期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重塑了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实践,导致了“少生优生”“少生幸福”等生育理念的社会性传播与认同<sup>[23]</sup>。但随着生育政策逐渐由紧缩转向宽松发展,社会经济层面的考量成为影响生育观念、干预社会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生育“成本—效用”理论认为,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生育子女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可能带来的“效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新生儿可以作为“生产品”进行使用,从而对家庭生产做出贡献,故而会导致社会生育需求的扩大<sup>[24]</sup>。而随着生育成本及抚养成本的急剧攀升,基于生育经济理性考虑,青年生育观念“自发朝向符合经济社会现状转变发展”<sup>[25]</sup>,导致社会总体生育意愿降低。

其次,在中国传统“家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家庭经济水平及代际支持对青年生育决策存在重要影响。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能够显著降低未育青年的生育犹豫和矛盾感<sup>[26]</sup>。家庭住房资产以及投资性房产的增加对生育需求的促进存在显著的“正向财富效应”,而购房负担则对生育多孩的概率具有“负向挤出效应”<sup>[27]</sup>。家庭代际责任转移和代际支持同样会影响青年生育意愿和实践。在传统农耕时代,由于代际责任义务的提供方更多在于子代群体,这直接导致了适婚群体生育意愿的增加<sup>[28]</sup>。而如今,父母辈所提供的隔代育儿照料,则被认为是提升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条件<sup>[29]</sup>。

最后,青年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伴随着生育意愿的自主性增强,微观个体特征层面的因素在影响青年生育行为方面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既有研究表明,青年群体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经济水平<sup>[30]</sup>、年龄<sup>[31]</sup>、宗教信仰<sup>[32]</sup>等多个纬度的个体特征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社会心理学范式内,生育意愿受到生育态度、主观规范以及行为知觉控制等个体内部主观因素的影响<sup>[33]</sup>。同时,个体不同生育动机的递次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对生育倾向造成显著影响<sup>[34]</sup>。

Z世代群体成长于社会物质丰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之中,网络媒介便利的信息获取方式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活动平台,这使得该群体拥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思想自主性。但与此同时,Z世代多为独生子女,并且存在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他们在未来的

婚育市场中同样会陷入较为激烈的争夺和抉择困境<sup>[35]</sup>。由此可见,影响Z世代群体生育观念的社会、家庭以及群体背景特征都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独特性。由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即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考察“个体-家庭-社会问题感知”结构性因素对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不同生育观念类型的影响,以期为制定配套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形成28 590份有效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一般而言,Z世代是指在1995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群体。因此,本研究选取出生年份在1995年至2010年之间的样本开展研究。同时,结合国家对于我国公民法定婚龄的规定(男性不超过22周岁,女性不超过20周岁),将不在法定婚龄内的Z世代群体进行剔除。此外,在将相关问题回答“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的个体视为无效值进行剔除之后,保留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的有效样本(n=1 025)开展进一步研究。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具体而言,该调查问卷中存在9项反映受访者生育观念的题项(ME201:生养子女是为了在自己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ME202:生养子女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ME203:生养子女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家庭;ME204:生养子女是为了看着孩子长大的喜悦;ME205:生养子女是为了子女在身边的快乐;ME206:生养子女是为了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ME207:生养子女是为了使家庭在自己的生活中更重要;ME208:生养子女是为了增强自己的责任心;ME209:生养子女是为了增加亲属联系)。为了便于后续开展针对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潜在类别分析,本研究将选择“5=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的样本进行剔除,并将选择“1=十分不同意”和“2=不同意”的样本重新编码为“0”,以反映受访者对相应题项的反对态度;同时,将“3=同意”和“4=十分同意”重新编码为“1”,以反映受访者对相应题项的赞同态度。

##### 2. 解释变量

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的影响个体观念及行为的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系统思路,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分为微观个体特征、中观家庭特征以及宏观社会问题感知三个结构性维度。在微观个体特征层面,本研究将收入(N8011)、学历(W01)、生活满意度(N12012)以及未来信心程度(N12016)作为研究的解释变量。在中观家庭特征层面,本研究将代际经济支持(F701)和代际关系(F5)作为研究的解释变量。在宏观社会问题感知严重性层面,本研究将贫富差距问题(N6013)、教育问题(N6015)、住房问题(N6017)以及社会保障问题(N6018)作为研究的解释变量。

#####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影响生育观念的性别、年龄以及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男性552人

(53.9%), 女性 473 人(46.1%); 年龄 22 岁 252 人(24.6%), 23 岁 244 人(23.8%), 24 岁 237 人(23.1%), 25 岁 292 人(28.5%); 在婚姻状态上, 未婚 839 人(81.9%), 已婚 186 人(18.1%)。

### (三) 统计工具与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数据分析流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 利用 Mplus 7.0 开展针对 Z 世代适婚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潜在类别分析, 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 确定最优类别概率, 产生不同生育观念类型并进行命名。第二, 建立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分别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问题感知三个维度分别探索 Z 世代适婚青年群体不同生育观念类型的影响因素。

在进行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拟合检验的过程中, 需要从零模型开始, 然后逐渐增加潜在类别的数量, 并观测各类拟合模型指标, 确定类别概率最优解, 形成最佳模型<sup>[36]</sup>。一般而言, AIC、BIC 以及 aBIC 是潜在类别模型选择中广为接受的评价指标, 且这三类指标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越好<sup>[37]</sup>。Entropy 值用于评估模型分类的精确程度, 通常该数值大于 0.8 被认为是分类精确率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sup>[38]</sup>。此外, 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拟合差异通常用 LMR 及 BLRT 分别对应的 p 值来进行观测, 即  $p < 0.05$  被同时满足时, 则证明 k 个类别的模型较之 k - 1 个模型更好<sup>[39]</sup>。

## 四、研究结果

### (一) Z 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类型的潜在类别

Z 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的潜在类别分析各项指标如表 1 所示。研究结果显示, 随着分类数量的增多, 模型 AIC、BIC、aBIC 的值不断降低, 且 Entropy 值不断增大。然而, 从模型 5 开始, 模型 BIC 的值不降反增, 且 Entropy 值小于 0.8, 同时 LMR 所对应的 p 值不支持显著性检验。因此, 将 Z 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分为 4 种类型为最优解, 所对应的类别概率分别为 53%、10%、9% 以及 28%。

表 1 Z 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的潜在类别分析各项指标检验

模型	AIC	BIC	aBIC	Entropy	p - LMR	p - BLRT	类别概率
1	8662.79	8707.26	8678.67	-	-	-	1.00
2	7508.33	7602.20	7541.85	0.76	0.000	0.000	0.63/0.37
3	7219.67	7362.94	7270.83	0.76	0.009	0.000	0.53/0.33/0.14
4	7142.00	7334.67	7210.80	0.81	0.000	0.000	0.53/0.10/0.09/0.28
5	7104.22	7346.29	7190.66	0.76	0.509	0.000	0.47/0.28/0.11/0.073/0.07

确定生育观念 4 种类型之后, 本研究进一步绘制了 Z 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 4 种类型在 9 个题项中的条件概率分布, 如图 1 所示。

根据生育观念 4 种类型在不同题项中的条件概率分布特征, 本研究将 Z 世代适婚青年 4 种生育观念类型进行如下命名:

家庭责任型(占 53%)。这一类型生育观念在 QME201、QME202、QME207 以及 QME209 这

四个题项上的条件概率均在0.9以上,且高于其他题项条件概率。这反映出这类青年更加具有强调家庭责任、维持传统生育观念的倾向,因此将其所持有的生育观念命名为“家庭责任型”。

自我愉悦型(占10%)。这一类型生育观念在QME204、QME205以及QME206这三个题项上的条件概率均在0.95以上,而在强调家庭观念的对应题项上的条件概率均在0.5以下。反映出这类Z世代青年更加重视生养子女的自我愉悦体验,因此将其所持有的生育观念命名为“自我愉悦型”。

犹豫延缓型(占9%)。结合图1可以看出,这一类型在所有题项上的条件概率均在0.5以下,反映出这一组别青年群体对生养子女总体上呈现出较为犹豫、延缓的心态特点,因此将其命名为“犹豫延缓型”。

个人责任型(占28%)。这一类型生育观念的条件概率在QME208这一题项上接近于1,且在QME203这一题项上接近于0。表明这一类型生育观念的青年群体极为强调生育的自我责任感,并弱化子女的经济义务与家庭贡献,因此将其所持有的生育观念命名为“个人责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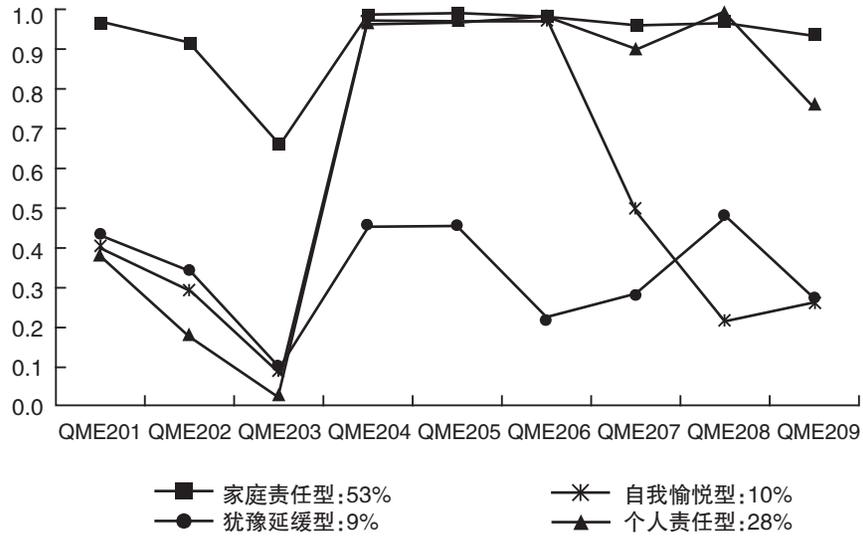


图1 Z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四种类型在对应题项中的条件概率分布

## (二)“个体-家庭-社会问题感知”特征对Z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

研究结果(见表2所示),相较于主流的“家庭责任型”生育观,性别、年龄、收入、学历、教育问题以及住房问题感知严重性与“自我愉悦型”生育观关系显著。在性别上,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加倾向于拥有自我愉悦型生育观;在年龄层面,年龄越大可能越不具有生育愉悦体验。在个体特征方面,收入越低以及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越有可能具有自我愉悦型生育观。然而,家庭特征层面因素与自我愉悦型生育观不存在显著关系。在社会问题感知层面,对教育问题感知严重性程度越低以及对住房问题感知严重性程度越高的Z世代青年,可能更倾向于具有自我愉悦型生育观。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主流“家庭责任型”生育观,“犹豫延缓型”生育观仅仅与女性、社

会保障问题感知严重性关系显著。即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可能持有犹豫延缓型生育观念。此外,对于社会保障问题感知程度越严重,越可能倾向于形成犹豫延缓型生育观念。同时,与“自我愉悦型”和“家庭责任型”对照组类似,家庭层面特征因素在“犹豫延缓型”生育观中不成为显著影响因素。

相较于主流“家庭责任型”生育观,“个人责任型”生育观与性别、收入、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感知关系显著。即女性更加倾向于具有个人责任型生育观念;收入水平越低以及生活满意度越低的群体,越可能倾向于强调生养子女过程中的个人责任;同时,对于贫富差距问题感知程度越高,越可能具有个人责任型生育观。与上述两组对照一致,即家庭代际层面特征在个人责任型生育观念中不成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表2 “个体-家庭-社会问题感知”三维结构变量与Z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类型间的关系

		自我愉悦型		犹豫延缓型		个人责任型	
控制变量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性别(男=1)		-1.31***	0.27	-0.81***	0.45	-0.83***	0.44
婚姻状态(已婚=1)		-0.47	0.63	-0.43	0.65	-0.06	0.94
年龄		-0.20*	0.82	0.03	1.03	0.02	1.02
解释变量							
个体特征层面							
收入	低收入	1.94***	6.93	0.49	1.63	0.58**	1.78
	一般	1.62***	5.05	0.17	1.19	0.68**	1.96
学历	高中、大专及以下	14.94***	3082713.36	-1.34	0.26	-0.50	0.60
	大学本科	15.71	6639566.52	-0.82	0.44	-0.29	0.74
生活满意度	不满意	0.53	1.70	0.33	1.39	0.89***	2.45
	一般	0.15	1.16	0.27	1.32	0.27	1.31
未来信心程度	没信心	0.85	2.34	1.26	3.53	0.97	2.64
	一般	-0.33	0.72	0.32	1.38	0.08	1.08
家庭层面特征							
代际经济支持(否=0)		0.16	1.17	-0.39	0.68	-0.11	0.90
代际关系	差	-15.47	0.00	-15.69	0.00	-0.59	0.55
	一般	-0.04	0.96	0.02	1.02	-0.18	0.83
社会问题感知层面特征							
贫富差距严感知	不严重	-0.47	0.63	-1.13	0.32	-0.13	0.88
	一般	-0.24	0.79	-0.21	0.81	-0.30*	0.74

(续表)

		自我愉悦型		犹豫延缓型		个人责任型	
教育问题感知	不严重	-0.69	0.50	0.43	1.54	-0.13	0.88
	一般	-0.47*	0.63	-0.12	0.89	-0.16	0.85
住房问题感知	不严重	-0.96	0.38	0.80	2.22	-0.51	0.60
	一般	0.56**	1.75	-0.17	0.84	-0.02	0.98
社会保障问题感知	不严重	0.14	1.15	-1.04**	0.35	0.34	1.41
	一般	0.29	1.33	0.07	1.08	0.15	1.16

注:\*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生育观念类型的参照组是“家庭责任型”,性别参照组是“女性”,婚姻状态参照组是“未婚”,收入参照组是“高收入”,学历参照组是“硕士及以上”,生活满意度参照组是“满意”,未来信心程度参照组是“有信心”,代际经济支持参照组是“有经济支持”,贫富差距、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感知参照组为“严重”。

## 五、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考察了Z世代适婚青年生育观念类型及其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该群体生育观念可划分为“家庭责任型”“自我愉悦型”“犹豫延缓型”和“个人责任型”四类,且“家庭责任型”生育观念占据主流。研究进一步发现,相较于Z世代适婚青年个体微观层面特征对各类生育观念的显著影响,中观家庭层面要素影响式微,宏观层面上的社会保障问题感知严重性成为影响“犹豫延缓型”生育观的关键变量。

目前,我国新生代青年群体生育观念逐渐呈现出保守、生育意愿持续降低的超势,被认为是青年个体特征、家庭投入、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变迁等情景性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sup>[40]</sup>。因此,需要从青年群体与其周围不同层次生态系统互动的视角考察青年生育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从人与环境和谐互动的生态整合视角出发,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实现“人的社会功能”提供了研究框架,通过关注个人与周围环境各个层次生态系统的互动作用,致力于回应个体、家庭以及外部社会系统的问题解决需要<sup>[41]</sup>。从这一角度而言,该理论最大的价值在于将抽象的系统理论思维与力图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导向进行了结合,并为现实干预行为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指南<sup>[42]</sup>。本研究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依据之下,揭示了多层次社会生态情景因素对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作用,从而扩展了该理论在青年生育领域研究的运用。然而,以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在回应有关青年儿童发展相关问题的有效性得以广泛证实,但仍然存在对系统理解过于笼统,存在对生态系统中的个体主体性、能动性未能得到必要重视的缺陷<sup>[43]</sup>。基于该理论使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研究者认为需要对环境系统中的个体特征进行重视,并呼吁将自我心理学等微观理论以及社会支持等中观理论,有机整合进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之内<sup>[44]</sup>。据此,本研究将Z世代适婚青年群体个体微观层面的特征纳入对该群体生

育观念影响的考量范围之内,并从家庭支持的视角考察了影响这一群体生育观念的中观系统生态。这不仅深化了不同社会生态系统因素对Z世代青年群体生育观念影响的认识,亦是对此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研究缺失之处的有效补充与回应,这为未来研究青年生育观念的形成、发展以及流变机制带来了新的研究路径启示。

基于上述学理层面的分析,启发了社会生育干预主体从改变影响青年生育行为的各类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系统出发,从而寻找解决青年生育问题的施策路径。从青年个体微观层面上看,本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对其生育观念造成了显著影响。因此,未来需要关注解决高学历群体,尤其是高学历女性青年的生育困境。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完善弹性工时、弹性工作地点以及产后再就业等工作保障制度,同时保障其孕育期间相关权利和福利待遇,以促进现代社会性别分工平等化。通过解决高学历群体初次生育之际所忧虑的关键问题,才能提升这一群体的婚育意愿。针对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青年群体,根据区域经济水平,需要探索健全生育津贴与生育奖励制度,通过实施奖励政策以及教育减免和税收减免等生育利好政策,缓解育龄群体的生育经济压力,增加青年生育的获得感和生育信心。从中观家庭层面上看,本研究发现维系家庭关系、重视家庭结构稳定以及恪守家庭责任的动机,依旧在青年生育观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未来媒体、权威机构以及专业人员的宣传导向需要进一步强调传统“家本位”生育价值观。通过社交媒体多模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优良传统生育文化进行包装整合,重点凸显青年生育对于家庭建设的责任价值和互惠性质,同时推进家庭代际生育支持、隔代抚养体系建设,提升家庭整体氛围对促进育龄青年生育的积极效用。从宏观社会保障层面上看,本研究发现,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制约Z世代适婚群体生育意愿的关键项。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提供完善且专业的公共托育服务,尤其是需要重点实施促进女性育后再就业、提高育后劳动参与率等“去家庭化”措施,构建更加人性化、系统性的生育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可探索建立政府财政支持以及社会资源协同参与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在不影响青年职业发展的同时保障育龄青年群体托育服务需求,发挥社会生育政策的兜底保障作用,消解青年群体生育犹豫心态,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生育环境。

## [ 参 考 文 献 ]

- [1] 聂建亮 董子越:《“三孩”政策:积极影响、多重障碍与因应策略》,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 [2][8][23] 穆光宗:《当代青年的“恐育”心理和生育观》,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
- [3] 洪秀敏 赵思婕:《家庭经济条件、养育成本对青年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的调查分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 [4] 朱文婷 王 梅:《生育支持对青年职业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 [5] 贺 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载《人口与健康》,2023年第4期。
- [6][9] 罗天莹:《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生育观念的变迁》,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 [7] 徐 俊:《中国人生育观念研究:回顾与展望》,载《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4期。
- [10][11][16] 赵 凤 陈李伟 桂 勇:《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十年变迁(2012-2021)——基于年龄、时期和世代分

析》,载《西北人口》,2023年第2期。

[12] 张蒙帅:《唯物史观视域下我国青年低生育率的成因与化解》,载《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3][18][40] 李 婷 郑叶昕 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3期。

[14][25] 杨宝琰 吴 霜:《从“生育成本约束”到“幸福价值导向”——城市“70后”“80后”和“90后”的生育观变迁》,载《西北人口》,2021年第6期。

[15] 陆士桢 李金锁:《“95后”上班族生育观研究——以G公司为例的调查》,载《青年发展论坛》,2018年第1期。

[17] 蓝宇东 仇 晴 黎熙元:《线上社会化与“Z世代”青年婚育观念的转变》,载《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

[19][42] 师海玲 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0] 查尔斯·扎斯特罗 卡伦·柯斯特-阿什曼:《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六版),师海玲 孙 岳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0页。

[21][24] 邓大才:《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社会解构模型——对当今部分农民生育偏好及行为逆变的一个解释》,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22] 贾志科:《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载《人口与经济》,2009年第4期。

[26] 邢朝国:《“既想生”又“不想生”——对未育青年生育矛盾心态的探索性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7期。

[27] 黄 静 李春丽:《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研究》,载《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4期。

[28] 王跃生:《代际关系与生育行为互动分析》,载《晋阳学刊》,2018年第5期。

[29] 甘雪慧 甘月文:《家庭分工、代际影响与青年知识分子的生育意愿——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调查》,载《广东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30] 周晓蒙:《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载《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5期。

[31] 风笑天 李 芬:《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32] 李 峰:《宗教信仰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CGSS2010年数据的分析》,载《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

[33] Billari, F. C., Philipov, D., Testa, M. R. Attitudes,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xplain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Bulgar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9, (4).

[34] 吴 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

[35] 王水雄:《中国“Z世代”青年群体观察》,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

[36] 张洁婷 焦 璨 张敏强:《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载《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8期。

[37] Hagenaars, J. A., McCutcheon, A. L.. Applied Latent Class Analysi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6 - 88.

[38] Lubke, G., Muthén, B. O.. Performance of Factor Mixture Models as a Function of Model Size, Covariate Effects, and Class-specific Paramete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007, (1).

[39] Muthén, L. K., Muthén, B. O..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 New York: Wiley, 2009, pp. 812 - 820.

[41] Bronfenbrenner, U., Ceci, S. J.. Nature - nurture Reconceptualized i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 Bioecological Model,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4, (4).

[43][44] 卓彩琴:《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脉络及展望》,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韩永涛)